

## 論包拯的「交際之道」

### 一、前言

包拯，字希仁，北宋廬州合肥人。生於宋真宗咸平二年(西元 999 年)，卒於仁宗嘉祐七年(西元 1062 年)，年六十四。事蹟具《宋史》。王佳歆的〈《宋史·包拯傳》疏證〉<sup>1</sup>一文，以《宋史·包拯傳》為研究對象，將〈包拯傳〉逐字逐句作一疏證。此外，亦可參看《仁宗實錄·包拯附傳》、《隆平集·包拯傳》、《東都事略·包拯傳》、《宋史·包拯傳》等書，唯以上諸書皆僅涉及包拯之子，對其祖先、妻室、子孫則無論及。至於歷來研究專書如張華盛、傅騰霄《包拯》、孔繁敏《包拯年譜》、屈春山、李學良《包公正傳》、程如峰《包公傳》、丁肇琴《俗文學中的包公》、于鐵丘《從包拯到海瑞》等書<sup>2</sup>，則可看出包拯受學界重視的程度。

包拯故居位於廬州府合肥縣東鄉虎山北麓，即今之安徽省肥東縣大興鄉包村。二十八歲時考中進士，被任命為大理評事，出任建昌(今江西永修)知縣。他以父母皆年過花甲，辭不就，確實遵循了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」的儒家規範。包拯至誠至孝之舉，傳聞遐邇，極受稱頌，其人感念父母鞠養，孺慕之情深意切。及至嘉祐四年(1038年)父母雙亡，年屆不惑的包拯始入仕途。

據《朱子語類》卷 129〈本朝三〉所載，包拯為官前曾拒絕富人屢次盛請，而有「今妄與之交，豈不為它日累乎！」之語；為官後主張「精選廉幹中正之人」、「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貪者，民之賊也」，長久以來，他的清官形象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，歷任知縣、知府、轉運使等地方行政長官，以及監察御史、御史中丞、知諫院等要職。又曾任過天章閣待制、龍圖閣直學士。故有稱之為包待制、包龍圖。據傳，因其為官清正、鐵面無私，故備受人們尊敬，有包老爺、包青天之稱。效法唐朝魏徵，稱己「披瀝肝膽，冒犯威嚴，不知忌諱，不避冤仇」，並多次批評仁宗朝令夕改，失信於民；也任過戶部副使、三司使等掌理國家財政官；還任過都部署、樞密副使等軍事要職，甚至當過外交使節，出使遼邦；以及天章閣待制、龍圖閣直學士，《宋史·歐陽脩傳》：「加龍圖閣學士，知開封府，承包拯威嚴之後，簡易循理，不求赫赫名，京師益治。」由於歐陽脩於宋仁宗嘉祐二年(西元 1057 年)權知開封府，因此可知包公威嚴。故有稱之為包待制、包龍圖；又因其為官清正、鐵面無私，備受人們尊敬，尊稱為包老爺、包青天。其道德名聲，在當時別人不敢望其項背。《宋史》卷 316 中記載：「與人不苟合，不偽辭色悅

<sup>1</sup>王家歆：〈《宋史·包拯傳》疏證〉，收於《嫦娥、李商隱、包拯探蹟》(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7 年)，頁 129-172。

<sup>2</sup>張華盛、傅騰霄：《包拯》(安徽：新華書店，1985 年)、孔繁敏：《包拯年譜》(安徽：黃山書社，1985 年)、屈春山、李學良：《包公正傳》(河南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)、程如峰：《包公傳》(安徽：黃山書社，1994 年)、丁肇琴：《俗文學中的包公》(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0 年)、于鐵丘：《從包拯到海瑞》(山東：濟南出版社，2004 年)。

人，平居無私書，故人親黨皆絕之。雖貴，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。」以下則根據《宋史》所載，臚列「與人不苟合」、「不偽辭色悅人」、「平居無私書」、「故人親黨皆絕之」分述其人交際之道。

## 二、與人不苟合

《禮記·學記》：「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」因此，講習學問，非徒靠己力所能獲致，而需相互砥礪。據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二十九〈本朝三〉有一段包拯為官前與友人共讀的記載：

泛言交際之道云，先人曾有雜錄冊子，記李仲和之祖，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，每出入，必經由一富人門，二公未嘗往見之，一日富人俟其過門，邀之坐，二公托以它事不入，它日復召飯，意謹慎，李欲往，包公正色與語曰：「彼富人也，吾徒異日或守鄉郡，今妄與之交，豈不為它日累乎？」竟不往，後十年，二公果相繼典鄉郡，先生因嗟歎前輩立己接人之嚴，蓋如此。<sup>3</sup>

這個故事與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有若干符合之處，根據記載「管寧、華歆共園中鋤菜，見地有片金，管揮鋤與瓦石不異，華捉而擲去之。又嘗同席讀書，有乘軒冕過門者，寧讀如故，歆廢書出看」，因此，管寧割席分坐，甚至怒斥：「子非吾友也。」正所謂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，《禮記·儒行篇》亦言：「儒有合志同方，營道同術。」包拯面對志趣不合的友人，則正色勸勉，並拒絕富人屢次盛請，有「今妄與之交，豈不為它日累乎！」之語。

《論語·陽貨》所謂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若是性之所近，多為賢良篤學之士。交往者為君子，則能達到《論語·顏淵》所說的「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」，因此，以德義相交，乃為君子行世之準則。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為人處世，若能自身行正，必有好德之士與之同行。職是之故，包拯嚴格護持本性。如《論語·憲問》中提到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「修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？」在層層追問下，可知君子修身的終極目標為天下百姓得到安樂。據載，包拯年少「挺然若成人，不為戲狎」，為官後曾向仁宗皇帝自述：「生於草茅，早從宦學，盡信前書之載，竊慕古人之為，知事君行己之方，有竭忠死義之分，確然素守，以期勉拘。」據此，以看出包公胸懷大志，希冀輔佐君主、治國安民。

另一方面，當時富人可招致賢人，如王安禮「喜結四方豪富，如杭州余緡，東南大姓，賈販小人。……遂奏緡為假承務郎。」即是一例。然從包拯之語可知雖言交友之道，不過，卻仍可窺其人讀書做官的志向以及待人接物的謹慎，因防「妄與之交」，而「為它日累」，顧慮日後為本地官會有所牽制。此乃有些地方官因交際鄉人過密，因而「遇事入手，處之頗有掣肘處」。由此也可看出包拯思

<sup>3</sup> 楊國宜：《包拯集校注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9年）。

慮細密，為長遠之計。包公心目中的理想官僚，乃是清廉、正直、忠君。三者的根基在於「治心」，在中國古代「道德政治」的語境裡，強調心性的治理意義和作用，乃是必然的要求。必須時刻保持「心」的「清」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做到寡欲進而清廉、正直。對於「心」的治理，在中國儒家思想史上，向來非常重視。譬如《論語·學而》所謂「學而時習之」一言，它的要點顯然落在「治心」，通過對於禮樂的學習溫習，而達到仁心境界，亦為「克己復禮為仁」之意。《孟子·盡心》則有「仁義禮智根於心」的說法。順此儒家傳統思想而來，包拯以「清心為治本」的觀念施諸政治，也是自然之事了。<sup>4</sup>或許，因有如此觀念，方能以「舉刺不畏權貴，犯顏不畏逆鱗」<sup>5</sup>著稱。

### 三、不偽辭色悅人

《宋史·包拯傳》中說他「拯性峭重，惡吏苛刻，務敦厚，雖甚嫉惡，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。」又，司馬光曾評論包拯：「為長吏，僚佐有所關白，喜面折辱人；然其所言若中於理，易番然從之。剛而不愎，此人所難也。」包拯不僅清廉自律，並立下《家訓》，要求子孫，為人稱道。《夢溪筆談》中也說他「天性峭嚴，未嘗有笑容，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」，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中說「包孝肅公立朝剛嚴，聞者皆憚之」；至於吳奎〈宋故樞密副使孝肅包公墓誌銘〉中則言包拯「早從宦學，盡信前書之載，竊慕古人之為，知事君行己之方，有竭忠死義之分，確然素守，期以勉循。」由此可見，剛毅峭嚴是他的本性，也深刻影響了他的生活作風。關於包拯的私人生活，同時代及後來人很少有記載。爬梳上述資料後，從「峭重」、「面折辱人」、「峭嚴」、「剛嚴」、「竭忠死義」等特質或許可以推測，一個如此威嚴，並且「未嘗有笑容」的人，其私人生活不太可能奢侈多采的。而且，旁人對他「推以忠恕」、「此人所難」、「憚之」，可見不為辭色悅人的包拯，使人又敬又畏。

包拯為官後主張「精選廉幹中正之人」、「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貪者，民之賊也」，正如《孟子·離婁》所言：「可以取，可以無取，取傷廉。」自奉儉約對吏治有積極作用，一芥不取的包拯始終如一，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六中記載：「雖貴，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。」由此可知，生活簡樸的包拯與當時宋代文人政客的生活風氣截然不同。又，包拯不僅竭忠於君、施愛於民，更致力於澄清吏治、強調法律之信，同時消除了慶曆新政以來的朋黨問題。包公指出：「朝廷累年以來，凡進用庶官，裁處大事，必避形跡，以為公道。上下相蔽，習以為常。有才者，以形跡而不敢用；不才者，以形跡而不敢去。事有可為者，以形跡而不為；事有不可行者，以形跡而或行。」這一情形，將會導致「正人結舌，忠直息心，不敢公言是非，明示勸誡，此最為國之大患也。」對於政治勢力能有效緩解調停的包

<sup>4</sup> 關於儒家心性思想的相關探討可見崔大華：《儒學引論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）、秦至華：《心治與政治》（南寧：廣西人民出版社）、包弼德：《斯文：唐宋思想的轉型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）。

<sup>5</sup> 胡儼：《包孝肅公奏議集·序》。

拯，亦發揮《荀子·君道》中所謂「其待上也，忠順而不解；其使下也，均遍而不偏。」如此身分則兼顧忠臣與清官。此外，在慶曆新政失敗的情勢下，包拯「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」，反對因循姑息、緘默自守，並為「非辜被譴」的執行新政的官員楊紘、王鼎、王綽等人辨理、恢復官職，並提出興利除弊的改革措施。包公的取捨標準，基本上是以道德為歸依。經過秦漢兩朝的實踐和變遷，儒法與禮法又出現了新的整合，從而奠定了其後兩千餘年的政治結構與治理模式。在這一宏觀歷史背景下，包公信奉儒家思想，或者說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，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但是，法家的影響同樣不可忽略。就《包拯集》而言，包公議論「治平之世，明盛之君，必務德澤，罕用刑法」時，不僅徵引漢儒董仲舒「天人感應」的學說，而且徵引《老子》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；其政悶悶，其民誥誥」<sup>6</sup>。

據《包拯年譜》，宋仁宗嘉祐四年(西元1059年)，包公六十一歲，三月時上書彈劾張方平、宋祁，為樞密直學士、權三司使。理由乃針對私生活而發：「祁在益部多遊宴，且其兄穰方執政，不可任三司」。《宋史·宋祁傳》記載：「尋除三司使。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，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，在蜀奢侈過度。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，且其兄方執政，不可任三司。」包拯彈劾張方平、宋祁，或據實而言，大公無私，心地光明。然張、宋二人方因包公彈劾，罷去三司使之位，包公即貿然接任三司使。似乎彈劾二人，為貪三司使之位，如此不避嫌因而無法杜天下悠悠之口。因此，《宋史·包拯傳》中，記有歐陽脩之言：「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，罰已重矣，又貪其富，不亦甚乎！」歐陽脩之言，蓋亦當時公論。又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一一一〈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〉：「此所謂蹊田奪牛，豈得無過，而整冠納履，當避可疑者也。」

據《宋史·宋祁傳》記載其「修唐書十餘年，自守亳州，出入內外嘗以稿自隨，為列傳百五十卷。預修《籍田記》、《集韻》。又撰《大樂圖》二卷，文集百卷。」可見文化成就非凡；又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十九記載他死後，成都「士民哭於其祠者數千人」，由此可知受民愛戴之深；而在私人生活上，確實如包拯所述，如陸遊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五載道：「宋景文好客，會飲於廣廈中。外設重幕，內列寶炬，歌舞相繼，坐客忘疲，但覺漏長，啟幕視之，已是二晝。名曰不曉天。」另外，亦與晏殊很有交情，宋祁常到晏殊的西園赴宴和賦詩，曾「會連舜賓別墅」、許田別墅、衡陽別墅，同萬秀才赴楊侯別墅。由此可見，宋祁雖生活奢侈，但卻深受百姓愛戴。奢靡之風是宋代文人普遍存在的一種風氣，文人賦詩風雅，引以為尚。但公正廉明的包拯，堅決反對，因此進行彈劾。

#### 四、平居無私書

士人常在強烈使命感的驅使下著書立說，並以此教化百姓。如司馬遷所言：「夫周室衰而《關雎》作，幽厲微而禮樂壞，諸侯恣行，政由強國。故孔子憫王

---

<sup>6</sup> 〈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〉，收於楊國宜：《包拯集校注》，頁 25。

路廢而邪道興，於是論次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修起禮樂。」<sup>7</sup> 因此，文以載道確實是一般文人所表現出來的精神。著書作文除了自身外，亦表達個人心志，或是宣揚和傳播聖人之道。包拯作為封建文官的一員，除了留下一部《孝肅包公奏議》和一首詩外，沒有任何別的文學作品流傳下來。曾鞏在《孝肅包公傳》中說包拯「平居無私書」；包拯同僚吳奎在〈宋故樞密副使孝肅包公墓誌銘〉也說他「不做私書」。這兩個人都是與他同時代的，應無虛言。身處文風鼎盛的宋代，包拯卻幾乎沒有文學作品留下來，根據學者研究，主因有三：仕途暢達，無憤憤不平之名；性格剛毅，無吟風弄月之興；文禍猖獗，警捕風捉影之言。<sup>8</sup>包拯作風與當時社會上的士大夫格格不入，也根本不會去與那些文人喝酒談天，吟詩作對，安於享樂。自然，更不可能去寫那些娛樂性的文字。正如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所言：「文辭，藝也；道德，實也」、「不知務道德，而第以文辭為能者，藝焉而已」、「文所以載道，輪轅飾而不庸，徒飾也，況虛車乎？」由此可知著書價值所在。

包拯自景佑四年正式踏入仕途，從知天長縣到樞密副使，中間除了一次因薦舉盧士安不當而貶官外，幾乎平步青雲、官運亨通，為歷代文官中所少有。此外，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卷八中有一段立太子事：

仁宗曰：「卿欲立誰？」公曰：「臣非才備位，所以乞豫建太子者，為宗廟萬事計耳。陛下問臣欲立誰，是疑臣也。臣行年六十且無子，非邀後福者，惟陛下裁察。」仁宗喜曰：「徐當裁之」。

從中可看出包拯受信任的程度，或許因而無憂憤可抒，自然也就無私書了。而且，仁宗有意於為治，不肯安於小成，以廣開言路、樂於納諫著稱。因此在位期間台諫之臣地位顯著提高，多有犯顏之臣。然而，台諫對宋政治的作用歷來有不同評價，褒者認為宋之正氣在台諫，抑制不正之風；貶者則認為台諫好生事，致使國事無定。其實運用好壞，操之於國君。<sup>9</sup>陳亮曾言：「臣聞之故老言，仁宗朝，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，凡事皆從中出，勿令人臣弄威福。」仁宗曰：「卿言固善，然措置天下事，正不欲專從朕出。若自朕出，皆是則可，有一不然，難以遽改。不若付之公議，令宰相行之。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，則台諫公言其失，改之為易。」宋仁宗皇祐初年任戶部副使的包拯奏〈論冗官才用等〉疏，認為仁宗時期國家財賦歲入倍多，此乃眾率暴斂的結果。

又經學者考訂，除了奏議諫稿，包公留下來的文字僅有〈言志詩〉和〈家訓〉。就此而言，包公全然沒有文人習氣。如歐陽脩〈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〉所載：「拯

<sup>7</sup> 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。

<sup>8</sup> 徐世民：〈試論包拯「無私書」之因〉，《懷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第 11 卷第 3 期，2012 年 6 月，頁 32-33。

<sup>9</sup> 南宋朱熹亦曾對當時腐敗的政治局勢提出看法：「今之監司，奸賊狼藉，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、台諫之親舊賓客。」此乃針對皇帝及其他高官。此外，在孝宗即位時所，則建議「任賢使能，立紀綱，厲風俗。數年之後，國富兵強，視吾力之強弱，觀彼畔之淺深，徐起而圖之。」凡此，皆能切中時弊。

性好剛，天資峭直，然素少學問，朝廷事體或有不思。」但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墓誌銘》卻講包公「喜讀書，無所不覽」，歐陽脩的說法與民間資料稱包公「文曲星」有所出入，然後者是否為溢美之詞？若將《包拯集》中切中時弊的部分與明代《海瑞集》相較，則文字較為通俗與淺顯。包拯的奏議諫稿，都是針對當時具體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，而無理論闡述。不論是吏治、法制或是邊事、賦役、賑災等課題，皆與仁宗時代的政治語境切合。

## 五、故人親黨皆絕之

從士人間的書信往來、詞語贈答，以及餽贈禮物的記載中，可大致了解交遊梗概。士大夫之間的交往活動，常見於結伴遊歷名勝古蹟或山水園林，也常見於互訪、宴集，以及結社。<sup>10</sup>然包拯卻無相關資料，可見其人一生交遊，不刻意抉結，曾鞏《隆平集》中則有〈包公傳〉<sup>11</sup>。

當包拯甫回本籍廬州，至友親朋，無不歡呼雀躍，笑顏逐開。結果紛紛前來拜望，個個掃興而歸。凡因私來訪，概吃閉門羹；凡處公事，繩之以法。包拯主張「法令者，人主之大柄，務須有法必依，執法必嚴」，即使是自家親戚，亦違法必究，不徇私情。有其堂舅者仗勢橫行鄉里，胡作非為，包拯在接到受害人的訴狀後，立即升堂問訊，審明情況，依法賞其堂舅七十大板。消息傳開，百姓奔相走告，歡欣鼓舞，盛讚包拯秉公執法，鐵面無私。「自是親舊皆屏息焉」，再無人敢為非作歹。

當時開封府為京都所在，官宦權貴、皇親國戚雲集於斯，他們上直通天，後臺硬實，政令推行不易。包拯到開封府任職後，首先改革不合理的訴訟程式，百姓可以直接向他投遞狀紙，有理無錢也能雪恨伸冤，以至當朝官宦權貴對他也畏懼八分。於是京師百姓有諺流傳：「關節不到，有閻羅<sup>12</sup>包老！」意謂包公肅貪拒賄，不畏強權。然亦有人批評他六親不認，不近人情，故作姿態，沽名釣譽。包公面對流言，曾揮毫作詩曰：「清心為治本，直道是身謀。秀幹終成棟，精鋼不作鉤。倉充鼠雀喜，草盡狐兔愁。史冊有遺訓，毋貽來者羞。」意謂清心寡欲是修身之本，正道直行為處世之道。只要是根正幹直的良木，必能成為棟樑之材；純粹的精鋼，不可扭曲為彎鉤；國庫充實，連鼠雀也會歡躍不止，若田裡寸草不生，狐兔也會犯愁；史書上記載著先賢的訓誡，為官者不能有惡行劣跡而被後人羞辱，此為包拯出仕做官的座右銘，亦反映了包拯居官的指導思想：正身立朝，寡欲清心，奉公廉法，無畏無私，剛直不阿，力鏟奸惡。做個無愧於先賢和後人的清官廉吏。諸種事蹟恰可呼應元代文學家元好問所言：「人信有清官」。

<sup>10</sup>相關資料可見陶晉生：《北宋世族一家族·婚姻·生活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史語所，2001年），第八章〈朋友交遊與日常生活〉，頁197-244。

<sup>11</sup>《隆平集》第11卷〈樞密〉。

<sup>12</sup>包拯死後被尊為閻羅之一，從「人」到「神」以及從「崇」到「拜」的過程是很有意思的。《通俗編》一書中認為「閻羅包老，是並言之，非謂包即閻王也。……今童婦輩凡言平反冤獄，輒稱包龍圖，且言其死做閻羅王。」這也可視為民眾的心願。

包拯曾言：「天下，大器也。群生，重畜也。古之聖王，禦大器，保重畜，蓋各有其道焉。以萬務之無極也，一統於上，豈可以思慮盡之邪？故立三公、設九卿、百執事，以維持之，稗群材盡力，而百工無曠，則王者正其本，執其要，而天下之大務舉矣。故治亂之原，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。」由此可看出包公吏治思想的大致脈絡：首先，皇帝統御天下，關鍵在於「群生」安集。此為民本、德治的基礎。其次，所謂民本就要他者進行治理，而非自治。而要做到以民為本，也就必然要求「以賢知賢，以能知能」。這裡，當然有個前提預設的問題，亦即誰是賢者？按照包公的預設，就是仁宗皇帝。在中國政治思想傳統裡，明主並不等於賢者，更不等於聖主。真正的賢者，道德意味很濃。而聖主更是「內聖外王」的體現，是道德與事功的完美結合。這也就是中國古代官僚知識階層一旦對於現實政治不滿，每每搬出三皇五帝作為批判武器的原因。就政治理想層面看，聖人政治其實就是「與道和諧」的政治，意即「道」的政治化、社會化，但隨著皇權政治的建立，在權力與知識或文化之間，已經出現斷裂，權力支配了知識或文化，收編了知識或文化，換句話說，知識或文化臣服於權力。這樣一來，皇帝也就成了聖主。無論是誰，一旦成為皇帝，至少在現實政治語境中，他就是聖者。就此而言，我們才能理解，為什麼古人稱皇帝為聖上。<sup>13</sup>

此外，在北宋仁宗時，朋黨之爭一直視影響政局的重要因素，對立雙方互指奸佞，黨同伐異，難免兩敗俱傷，包拯卻未陷入此政治漩渦，此正體現《論語·子路》中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」的道理，不攀附援引任何一方，不盲目苟同，自能奏議平允。

## 六、結論

君權的鞏固和政治運作需倚賴官僚體系的維護，如《漢書·高祖紀》所言：「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，同安輯之。」因此，從漢代起，察舉選拔官員的方式正是孝、廉等道德標準<sup>14</sup>，至兩宋時，則為「清官崇拜」觀念的正式發軔與形成期。<sup>15</sup>身處當時的包拯「與人不苟合」、「不偽辭色悅人」、「平居無私書」、「故人親黨皆絕之」，不僅做到《周禮·天官冢宰·小宰》定義的廉吏<sup>16</sup>，亦符合《論語·衛靈公》的「君子義以為上」與〈述而〉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」、「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」，以義制利。<sup>17</sup>魯迅曾說：「我

<sup>13</sup> 相關資料可參見余英時：《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）、黃進興：《優人聖域：權力、信仰與正當性》（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）。

<sup>14</sup> 相關資料可參考葛荃：《權力宰制理性：士人、傳統政治文化與中國社會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43。

<sup>15</sup> 于鐵丘：《清官崇拜談：從包拯到海瑞》（濟南：濟南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8。

<sup>16</sup> 《周禮》：「一曰廉善、二曰廉能、三曰廉敬、四曰廉正、五曰廉法、六曰廉辨。」此乃表達官吏治事與道德修養的綜合表現。

<sup>17</sup> 此處將君子與「義」加以聯繫，並提高「義」的地位。然而，強調義的同時，並不反對功利活動。相關資料可見劉學斌：《北宋新舊黨爭與士人政治心態研究》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118-119。

們從古以來，就有埋頭苦幹的人，有拼命硬幹的人，有為民請命的人，有捨身求法的人，……這就是中國的脊梁。」包拯自是其中脊梁。除此之外，《禮記·學記》：「七年視論學取友，謂之小成」。原指古代教學，在學生入學七年時考察在學術上是否有獨到的見解，及對朋友的選擇，這時候可以稱之為小成。是以，從一個人的論學取友中，得以想見其為人處世之道。綜上所述，本文由包拯交際之道觀之，亦不愧朱熹所譽「可謂法也」。

## 引用書目

### 一、傳統文獻

漢·鄭玄注，《周禮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。

漢·司馬遷，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9。

宋·曾鞏，《隆平集》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71。

### 二、近人論著

丁肇琴 2000 《俗文學中的包公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。

于鐵丘 2004 《從包拯到海瑞》，山東：濟南出版社。

王家歆 2007 《嫦娥、李商隱、包拯探蹟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

孔繁敏 1985 《包拯年譜》，安徽：黃山書社。

徐世民 2012 〈試論包拯「無私書」之因〉，《懷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11.3: 32-33。

屈春山、李學良 1987 《包公正傳》，河南：中州古籍出版社。

張華盛、傅騰霄 1985 《包拯》，安徽：新華書店。

陶晉生 2001 《北宋世族一家族·婚姻·生活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史語所。

程如峰 1994 《包公傳》，安徽：黃山書社。

楊國宜 1999 《包拯集校注》，合肥：黃山書社。

葛荃 2003 《權力宰制理性：士人、傳統政治文化與中國社會》，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。

劉學斌 2009 《北宋新舊黨爭與士人政治心態研究》，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。